

陈雪 主编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论道



论道

陈雪 主编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道 / 陈雪主编. —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646-3870-2

I. ①论… II. ①陈… III. ①江苏师范大学—教师—
访问记 IV. ①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23993 号

书 名 论 道

主 编 陈 雪

责任编辑 夏 然 侯 明

出版发行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徐州市解放南路 邮编 221008)

营销热线 (0516)83885307 83884995

出版服务 (0516)83884895 83884920

网 址 <http://www.cumtp.com> E-mail: cumtpvip@cumtp.com

印 刷 徐州市今日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16 字数 23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言

序言

江苏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华桂宏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承担着神圣使命。传道者自己首先要明道、信道。”习近平总书记对高校教师提出了明道、信道、传道的新要求。明道，即深刻认识和把握事物存在发展的普遍规律与本质特性；信道，即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信念；传道，即努力传播先进思想文化、科学文化知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从明道、信道再到传道，总书记为高校教师如何立德树人指明了方向。

这本《论道》，就是我校教师积极探索、践行新时代高校教育工作者为人、治学、为师之道的宝贵总结。《论道》自开始征集文稿，全校教师积极响应，精心撰写投稿。从率先垂范以德立身施教，到分享读书治学心得，再到畅谈创新对科研的重要意义……《论道》堪称师大人立身治学、教书育人的精神富库，是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成果，也是我校校园精神文化的凝聚传承。这些文章先是在《江苏师范大学报》四版连载刊发，后又在我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网站上集中发表，在学校广大师生中引起良好反响，老师们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为师大学人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做出示范，为青年教师育人从教树立了榜样，也为青年学生成长成才树立了典范。

如今,《论道》出版在即,凡六十篇,十四万字,这部度人金针、授人以渔之作将继续为更多的师大学人提供宝贵的治学从教指导和借鉴经验。这是我校“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传统师范精神的薪火相传,是我校师德建设成果的进一步固化,也是我校思想政治工作建设成果的持续放大。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大学考察,在参加师生座谈会时指出,古人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总书记借此表达对我们的“大学”出“大人”的期待,无谓官职、只论品性的“大人”,是品格上的君子,是学业上的才俊,是心理上的成人,是国家的真正栋梁。如何明道、信道、传道,从《问道》到《论道》再到《弘道》,江苏师大以系列丛书的形式交上了自己的答案。

《问道》《论道》《弘道》三本书一脉相承,各有侧重。《问道》记录我校举办的“咖啡时光·教授有约”系列活动,以“教授微语录”的形式呈现,是通识教育的别样展现,也是师生精神上碰撞出的火花。《弘道》收录《江苏师范大学报》近年来对我校优秀教师的系列采访通讯,该书将“讲师大故事,塑师大榜样”作为编写原则,从科研一线到三尺讲台,从文化传承到反哺社会,处处都能看到师大典范。从《问道》的“微语录”中,师生面对面相与探源析理;到《论道》中,老师们寄意篇籍,笔墨交心青年学子;再到《弘道》里,老师们身体力行,知行合一,可以说这套系列丛书,多方位展现了师大聚焦立德树人总目标的“三全育人”工作大格局和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也彰显了师大结合自身定位和优势,大力培育先进校园文化,以文化人的丰富形式和优势成果。

用真理的力量感召学子,用优秀的文化感化学子,育人育心,成人

序言

立人,为建设高水平、有特色、有品位的综合性教学研究型大学提供坚强思想保障、强大精神动力、丰润道德滋养和良好文化条件,《问道》《论道》和《弘道》系列丛书的出版就是江苏师范大学致力提升思想政治工作质量的最好实践和见证。希望更多师大学人能够从书中汲取前行力量,爱国、励志、求真、力行,切实做到有执着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不辱时代使命,不负人民期望。

是为序。

目 录

治学的根本在创新	李成蹊 (1)
教学宜深 治学须透	余明侠 (4)
坚持原则 不人云亦云	袁宗亮 (9)
何妨奋笔且习文	刘秉果 (12)
为师为学尽心也	邹寿昌 (16)
板凳要坐十年冷 文章不写一句空	叶 青 (19)
课堂教学贵在常讲常新	朱锡强 (23)
生也有涯学无涯	王云度 (28)
严谨治学 点滴树人	宋保林 (32)
一点哲思初见时	
——上好哲学第一课	刘家钜 (37)
教学和鸣寻音去	费承铨 (42)
千磨万选始出来	
——谈科研选题	黄志强 (48)
与书结缘	邱鸣皋 (51)
治学三题	汪缚天 (54)

目 录

教学相长	梁大志 (58)
教学风格中的师者本色	李慕寒 (62)
为学随笔	吕锡成 (65)
教师之所“忌”	吴大益 (69)
良好状态成就高效工作	王太昌 (72)
学林中的诗意徜徉	
——我与“新诗研究”	徐荣街 (75)
精心设计上好课	陈利国 (80)
优化课程结构,编写创新教材	吴子汇 (83)
读书是生命的“光合作用”	张素珍 (86)
谈谈如何搞好课堂教学	周明儒 (89)
耕耘一方创新之田	阎志强 (95)
让数学的火焰燃烧得更加光彩夺目	戴朝寿 (99)
治学——高校教师生命存在的重要方式	狄尧民 (105)
说文解字话甘辛	古敬恒 (109)
教书育人	朱必才 (113)
勤学而不厌 诲人而不倦	朱亦仁 (117)
学高为师 潜守匠心	李开荣 (121)
谈读书修文	叶正渤 (127)
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姚国天 (134)
肩荷重任 立德树人	赵兴勤 (139)
施教须做苦功夫	韩立尧 (142)
立身立学立“规矩”	刘洪英 (145)

再思考,再认识,再探索

——科研创新途径琐谈	张成福 (148)
树立良好学风 端正科研态度	杨绪敏 (153)
修身心与治学问	吴忠海 (157)
文心美 天地合	鲍继平 (161)
科学研究的一点体会	屠树江 (166)
积微研深知治学	王跃平 (170)
保持学术敏感性 边缘领域拓课题	管 华 (175)
激发学习兴趣 注重教学艺术	彭长德 (178)
“对症下药”	冯照军 (182)
深入浅出 做好学生知心人	童启贞 (185)
比较、讨论与评价	王晓君 (189)
谈教学的“三多”“三少”	刘 玲 (192)
严谨治学 诗意栖居	黄晓学 (196)
一切为了学生	邢邦圣 (200)
授之以法	

——工科教学的导语艺术	郭永环 (204)
精心备课 常备常新	李顺才 (208)
脑子里多装几个问题	周苇风 (212)
看长看远,做个有思想的人	张生珍 (215)
“研途”中师生与时偕行	王 帆 (218)
涧户寂无人 纷纷开且落	方 艳 (222)
英雄不论出身 不断超越自我	石 枫 (227)

总有一扇门为你打开	赵鹭明 (231)
如何让文学课程更具“文学性”?	吕靖波 (235)
志存高远,稳步前行	刘 伟 (238)
后记	(243)

治学的根本在创新

李成蹊

治学之道甚多，而其根本在创新。创新是治学的灵魂。假如失掉这个灵魂，便谈不上什么治学了。

现在，我先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我国古代有一首长诗，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作者为无名氏。郭茂倩《乐府诗集》载此诗于《杂曲歌辞》，题为《焦仲卿妻》，称“古辞”，并说：“《焦仲卿妻》不知谁氏之所作也。”现在一般人取此诗首句，名之为《孔雀东南飞》。

诗中有这几句：

入门上家堂，进退无颜仪。阿母大拊掌，不图子自归：“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汝今何罪过，不迎而自归？”

清代学者纪容舒《玉台新咏考异》谓：“‘誓违’二字，义不可通，疑是‘誓违’之讹。‘誓’古‘愆’字。”这种改字来解释，并没有什么依据，根本不可信。但是丁福保、闻一多、于冠英等学人皆采用此说，不知何故此？

“誓违”二字是动宾结构的变式，其常式当为“违誓”。“违誓”谓违背约束也。黄节说：

《说文》：“誓”，约束也，《孟子》：“女子之嫁也，母命之曰：‘往之女（汝）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无誓违”谓无约束也。当是用《孟子》义。

黄氏说：“无誓违谓无约束也。”这样来解释是可取的，完全正确。

从这一实例，既可以看出古汉语的句法结构有常式与变式的不同：“誓违”是动宾结构的变式，其常式则是“违誓”也。同时，又可以知道解释这类语句，对其变式也应该用常式来解释它，才易于获以正确的解释。

古汉语里还有这类变式句型之例。如：

- (1) 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左传·庄公十年》）
- (2)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荀子·天论》）
- (3) 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屈原《离骚》）

上三例“肉食”“物畜”“常违”都是动宾结构，“食肉”“畜物”“违常”的倒置，而为其变式也。

知“正”与“变”，对句意的理解至关重要，而用其变式者，则是一种修辞性较强的说法。

治学要有创新的精神，此其一例也。

现再举一例说明之。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写有名篇《封建论》，其中有这几句：

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覲会同，离为守臣捍城。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的《柳宗元诗文选注》解释“布履星罗”说：“布，公布。履，脚踏到。罗，罗列。这句意为：诸侯小国在各地像

星一样地罗列着。（指人们足迹所到之处，都是诸侯的领土。）”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的《柳宗元诗文选》解释说：“布履，指诸侯封地的疆域。星罗，像繁星似地罗列。”这些解释，都拘泥字面，扞格难通。

宋代世采堂刻本《河东先生集》谓：“履，作濩，濩，散也。《选》：‘声教布濩’。”这样看来，“布履”就是“布濩”，也就是“布护”“布覆”“尊濩”等。这些词都是叠韵联绵词，写法虽然不同，其实是同样一个词，都有遍布或分散的意思，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并字异而义同”也。（引见王念孙《广雅疏证》卷六上“逍遥徜徉也”条的疏证）

治学贵有创新的精神，于此可见矣！

教学宜深 治学须透

余明侠

我退休已经多年,近受校方有关部门之嘱,要我写一篇有关自己在教学与治学方面的一些体会,供青年学生参考。盛情难却,遂不揣鄙陋寡识,勉成小文如下:

我未退休前,从事历史教学有数十年之久。主要的任务是讲授中国近代史。其中我最感兴趣的课题之一,就是“洋务运动”。根据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这是从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变化的角度来阐述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形成。可以说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因此,我联想到中国近代何时出现自己的蒸汽机。

自从 1840~1842 年的鸦片战争,清朝政府惨败之后,有识之士深感西方列强在军事武器方面的优越性,远比自诩为“天朝上国”的大清王朝要先进得多。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使得清军望风披靡,毫无招架之力。于是他们就开始了解西方,进而主张学习西方。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四洲志》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写成的。其友人魏源又进一步加以整理扩充,终于在 1842 年推出了一部比较全面地介绍西方先进国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情况的《海国图志》(1842 年初刊本为 50 卷,1852 年增为 100 卷)。这部书

明确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也就是说要学习西方列强(夷)之长(船坚炮利),来抵抗它们对中国的侵略。所以,学习的重点主要放在军事方面。这是因为人们对任何新事物的认识都不可能一开始就明察秋毫、洞察底蕴,而是要有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不断实践和不断探索的过程,才能逐步提高和深化。

《海国图志》的面世,不仅对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兴起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东传日本,对明治维新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洋务运动开始的时间,一般定为1861年。因为这一年,清朝中央政府设立了类似外交部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管洋务)。之后,又创办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学校“同文馆”,以培养翻译人才。在地方上,曾国藩于1861年在安庆建立“内军械所”,开始研究如何仿制西方的坚船利炮。后来造出了一艘命名为“黄鹄号”的小轮船,尽管它在长江上试航还不够灵活、不够理想,但它毕竟是用蒸汽机发动的,说明中国向西方学习真正迈开了第一步,也标志了中国的蒸汽机时代已来临。

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创立江南制造局,专门制造西式枪炮和轮船。1866年,左宗棠创立福州船政局,制造轮船。同时,又设立福州船政学堂,以培养驾驶轮船和制造轮船的专业人才。以后,各地兴办的军事工业如同雨后春笋一般,越来越多。为了解决工业所急需的煤铁等原料,各地又逐步开始兴办各种工矿企业,并由官办扩大到商办。同时,又成立轮船招商局和兴建铁路以解决日趋紧迫的运输问题。随着各项洋务事业的蓬勃发展,为了培养各种专门人才以摆脱处处依靠外国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困境,于是各种新式学堂又接踵兴办,还不断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洋务运动遂由第一阶段的

“自强”(侧重于军事)进入第二阶段的“求富”。民营工商业也随之兴起。中国的资本主义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日渐成长,也使得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起了变化。

据上可知,自 19 世纪 60 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也就慢慢地从“手推磨”的时代转向“蒸汽机”的时代,当然它的转变还不全面、彻底,封建主义的势力仍然很强大。

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清政府中央有恭亲王奕訢,大臣桂良、文祥等人,在地方上则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其中又以李鸿章兴办洋务的时间最久、项目最多,堪称是一个执牛耳式的人物,因而后世对他的议论也最多。上述这些人物均来自封建官僚阶层,“洋务”一词是由“夷务”变化而来。由于他们积极倡办洋务,就被人们称为洋务派。但在当时长期封闭落后的中国,要想引进任何一项西方的新技术、新设备,都是举步维艰、困难重重。因为在清政府内部还有一批地位煊赫、势力强大的封建顽固官僚(即顽固派),他们动辄用“以夷变夏”“背叛”“祖宗之法”之类的大帽子来反对兴办洋务,甚至在上海还出现过已经修好的一条很短的铁路,也在他们以“破坏风水”为名的叫嚣下,又花钱拆掉的事情。这样的论调,在今天看来似乎很可笑,但在一百多年前的旧时代,却是振振有词、很有市场的。

我在充分备课的基础上,在教学时可以很清楚地讲述洋务运动的来龙去脉,使学生留下清晰而深刻的印象。然而如何评价洋务运动及洋务派的历史功过,我却束手无策。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作为一名历史教师,我只能照本宣科、依样画葫芦而已。

1976 年“文革”结束后,我的治学已不仅仅局限于以教为主,而是

更上层楼要讲深讲透,真正尽到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因此,我的治学重点就放在科研方面。只有如此,我才能够比较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评价洋务运动。我基本上肯定了它在引进西方先进新事物,把封建落后的中国推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所起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指出其局限性。对于这一运动的性质,我的看法是:一次在不触及清朝封建政治体制前提下,所进行的涉及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改革,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这是不能否定与忽视的事实。为了更好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与看法,以提高教学质量,于是我就着手深入研究洋务运动。

我利用课余之暇及节假日,先后写了《评价洋务运动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载于《江淮论坛》1983年第2期)、《关于李鸿章等洋务派任务的评价问题》(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留美学生在洋务运动期间的主要建树》(载于《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李鸿章在中国近代矿业上的地位》(载于《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1期)、《李鸿章和甲午战争前后的铁路建设——兼论洋务运动在甲午战争后的新发展》(载于《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左宗棠晚年洋务思想的变化及其进步性——从徐州近代煤矿的创建谈起》(载于《学术月刊》1986年第10期)、《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不容忽视》(载于《江淮学刊》1989年第2期)以及《近代徐州利国》(载于《历史研究》1986年第5期)等一系列论文,其中多为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中国近代史》所转载,也有的被《新华文摘》所摘登。这些论文的持续发表,不仅给青年学者以启发,使他们感到获益匪浅,也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